

毛泽东的座车

陈嘉庚赠送两辆“福特”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主席一直没有自己的专用轿车。早在延安时期，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仰和爱戴，专程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党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主席配一辆，主席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后来，毛主席到底没要专车，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当然，偶尔也会被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人紧急调用。

乘坐美式吉普进入北平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今北京）迁移时，毛主席坐的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军用吉普车。毛主席还乘坐它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

毛主席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他马上批示有关部门，将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吉斯-0”、“吉斯-5”等一批高级轿车赠送给中国领导人。所以，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乘坐的都是苏联产的

“吉斯”防弹保险轿车。这种车有8个缸，耗油量相当大。

毛主席身高体胖，尤其爱出汗。一到夏天，车里如蒸笼一样，为保证安全，车窗不能随意打开，为降低车内温度，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座的间隙，放上一个盛冰块的盆子，以此调节车内温度。毛主席从没对这种土办法感到不满，或提出什么要求。车内的冰盆就这样伴随他度过了十几个炎夏，直到1966年，首批中国自产的20辆“大红旗”轿车替换了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苏联车。

中国造“大红旗”

1950年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在与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的礼仪不周刺伤了主席的自尊心，所以，主席回国后很少坐他的“吉斯”专用车。赫鲁晓夫上台后对中共态度更不友好，同时国外还在封锁我们，此时主席坐的车已是超期服役了，但没办法从外国买车。因此，主席很希望能早一天坐上我国自己制造的轿车。

1958年5月5日，由一汽试制的我国第一辆“东风”牌71型小轿车，进京给毛主席试乘。在“东风”牌轿车的基础上，1958年7月，第一辆“红旗”牌CA72型高级轿车试制成功。

“红旗”车开始是参照“克莱斯勒”C69型试制的，但

车身完全自行设计，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车身硕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具有元首用车的气派。车前格栅采用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灯使用了大红灯笼，别具一格。发动机罩上方的标志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极富动感。内饰仪表板用福建大漆，周边镶以胡桃木条，座椅包裹了杭州名产织锦缎，民族气息十分浓郁。这一车型连续生产到1966年，共制造了202辆。

1965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汽在CA72的基础上，试制成功CA770轿车。这是一款三排座的高级豪华型轿车，增加了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的位置；车身加长，显得更加壮观豪华；部分车还配置了自动变速器，质量基本稳定可靠。这才真正成了中央领导人的专用车。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红旗”CA722轿车开发成功，这种防弹“大红旗”专供政治局常委使用。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大红旗”无大差别，只是略微高大一些，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的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

防弹“大红旗”共生产了12辆，第一辆给了林彪，周恩

来、朱德以及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都乘坐过，而毛泽东在1972年才坐上自己的防弹车。

未坐上加长“大红旗”

毛主席曾指示生产一种三开门“红旗”加长型轿车，只可惜这辆车造出来后，毛主席已去世，因此，这辆车称“亚洲第一车”（当时亚洲还没生产过10米长的轿车）的“大红旗”鲜为人知。目前这辆车由国内颇有名气的老爷车爱好者、河北省承德市的雒文有收藏。

这辆加长型“大红旗”轿车堪称“国宝”。据长春一汽研究所的同志介绍，上世纪70年代初，国外汽车业看不起中国的汽车制造产业和研制水平，认为与世界汽车产业有较大差距。毛主席当即指示：“要造我们自己最长的车。”一汽欣然受命，终于在1976年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加长轿车。但这一年，毛主席逝世了，于是这辆唯一的加长“红旗”车也就一直未能使用。

这辆非凡的“大红旗”轿车，不仅外观奇特，内部设施也非常完备，装有空调、冰柜、电视、卧室，显示了我国上世纪70年代汽车工业的最高制造水平，也是中华民族骄傲。据说，前不久，香港一富翁曾以5辆“奔驰600”高级轿车欲交换此车，南方一老板也愿以260万元的价格购买此车，但都被收藏者拒绝了。

（摘自《今晚报》）

邓小平：对我的评价不要分量太重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把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人请到家中，商量他退休的具体事宜。

邓小平对大家说：现在看来，想要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

邓小平继续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

对于退休的方式，邓小平说：“我同杨尚昆同志谈过，越简单越好。不要形成个惯例，对退的人都歌功颂德一番，那实在没有必要。你一生是什么样子，你在党内搞了几十年，人们都是看到的，有个客观评价。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就在谈话的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

11月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摘自《总设计师邓小平》）

孙中山取日本名字

清末，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流亡海外，鼓吹排满革命。在日本居留期间，他们多为自己取了日本姓名。1897年，孙中山自欧洲来到日本，先取名为“中山樵”，后称“高野长雄”，因为日本维新人士中有一个高野长雄。孙中山的朋友陈少白则取名为“服部次郎”。至于保皇党人梁启超，他在流亡日本期间，由于倾慕日本名士吉田松阴，自名为“吉田晋”。（摘自《周末报》）

杨得志的婚事

1938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团长杨得志率部在晋西南地区休整，结识了当地一位老乡。一次，老乡问他：“长官，你有老婆没有，给你找一个吧？”杨得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还没有啊，你给找一个吧。”那个老乡还真的替杨得志物色了一个姑娘，高小毕业，长得挺漂亮。

这之后的一天，杨得志与团政委吴法宪去师部开会，吴法宪替杨得志写了一个结婚报告，揣在身上。开会前，杨得志试探着问师政委罗荣桓：“现在有的干部想找老婆，怎么办？”罗荣桓马上说：“找什么老婆，连代师长陈光（此前师长林彪已经负伤）都还没有老婆，别人着什么急？”

杨得志赶紧悄悄地对吴法宪说：“千万别把报告拿出来，师长还没老婆，我这个当团长的怎么能跑到前面。”不久，部队开赴前线，杨得志的这桩婚事最终还是作罢了。（摘自《周末报》）

午餐肉帮盟军打赢二战

20世纪30年代初，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被经济大萧条所包围，购买力持续下降，迫使商人想方设法制造便宜的商品。1932年，明尼苏达州奥斯汀市的荷美尔公司创始人之子杰伊·荷美尔发明了一种12盎司罐装的午餐肉，它由火腿、猪肉、糖、盐、水和马铃薯淀粉制成，最大特点是比鲜肉保存时间长，价钱比普通肉制品低廉得多。

可是，荷美尔公司生产的午餐肉一开始却没有打开市场。起先，它的名字叫“荷美尔五香火腿”，结果没几个人注意。后来，公司用“猪肩肉加火腿”的缩写“SPAM”（发音为“斯帕姆”）作为这种食品的新商标。1937年6月5日，第一罐经过重新包装的斯帕姆午餐肉横空出世，便宜的价格着实让不少穷人动心。

真正让斯帕姆午餐肉大红大紫的是烧遍四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1941年，美国正式向德意日法西斯宣战，几百万美军开赴炎热的太平洋岛屿、北非沙漠和白雪皑皑的北极战区，复杂的气候环境令负责部队伙食的后勤保障部门头疼不已。这时，易储存的罐装斯帕姆午餐肉显示了其重要作用。1941至1945年，美国战争部花费3.73亿美元，采购了数以10亿计的斯帕姆午餐肉罐头。

美国的盟国对这种天赐的珍贵食品充满感激。无数斯帕姆罐头被分发给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和苏联的部队和平民。1944年诺曼底战役结束后，美国第四步兵师的官兵正在野战食堂里抱怨斯帕姆午餐肉时，正巧被两名来访的英国军官听见了。他们二话没说，从美国兵的餐盘里捏起两片午餐肉丢在地上，粘满尘土，然后拣起来塞进嘴里。这个动作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家伙有什么好抱怨的，和英国人吃的东西比起来，这简直是盛宴了。”

在苏联红军中，斯帕姆也很受欢迎。后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时，曾对美国记者坦承：“当1941年苏联大粮仓乌克兰被纳粹分子占领后，如果没有美国援助的斯帕姆，我们当时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养活红军了。”（摘自《战争史研究》）

赵尚志惨死在叛徒的黑枪下

赵尚志死于叛徒刘德山的背后黑枪。

1942年2月12日凌晨，东北抗日联军名将赵尚志带领他的士兵向梧桐河方向移动。部下刘德山说：“咱到菜园子里暖和一下。”又说，“你们先去，我去解手”。说罢，他转身行至赵尚志身后，举起步枪。

子弹从腹部穿过，赵尚志倒在地上。毕竟是赵尚志，他操起手枪，朝刘德山打去，刘的头、腹部各中一弹，当即毙命。

赵尚志被扶进附近一个孤独的农家小屋，屋内新婚不久的女主人吓懵了。但听说赵司令，便用结婚缝制的被褥包住赵尚志，并用

温暖的手捂着赵尚志被冻得冰凉的手——直到今天，这个当年的年轻媳妇已经老了，但还保存着包裹过赵尚志身体的被褥。

在一个寒夜里，一队日军和伪警察，在另一个刚从赵尚志身边溜走的汉奸张锡蔚的带领下，潜行过来。短暂激战后，赵尚志昏迷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爬犁上，他说：“只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想到死在刘炮（刘德山）手里”。

此时，赵尚志才知道，此行自己身边的5个人中，就有两个是汉奸。

此前短短的几年间，赵尚志的部队从最初的7人发展到6000人，在数百场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很少有

失败的时候，其天才般的谋略，让日军闻风丧胆，发出“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感叹。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一直有“南杨（靖宇）北赵（尚志）”的说法。而前者也于1940年2月23日，被一个汉奸带来的日军杀害。

抗日14年间，东北战场上出现了难以计数的汉奸。以赵尚志为总司令的东北抗联抗日联军中，也出现过一些汉奸，他们从军长到师长到普通士兵，什么级别的人都有，以至于赵尚志对汉奸，一直有着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和戒备，却不料最终还是宿命般死在了汉奸枪口下。

（据《党史纵横》）

蒋介石与“领袖汤圆”

抗战期间，日本飞机疯狂轰炸重庆。在浓雾弥漫的一天清晨，蒋介石早饭方罢，便召集陈布雷等随从巡视街道。

当一行人来到白龙池街口时，蒋表情严肃起来。他举起手杖指着一家叫“领袖汤圆”店铺。蒋介石手杖重重一拄地，神情愤怒地说：“领袖当汤圆吃了，还有什么领袖？”

当天中午，陈布雷紧急约见重庆卫戍司令刘峙，要求他“严密监视‘领袖汤圆’店，火速查明并禀报店主身份及其政治背景”。

一周后，有关方面把厚厚一叠《侦讯详情》摆在了陈布雷的案头：“兹查实‘领袖汤圆’店主，姓何名凯，小学两年，初识文墨。经邻里帮凑，赁白龙池街铺面一间，专营汤圆，聊敷温饱。该民自恃识文断句，然却不求甚解，竟将屡见报端之‘领袖’一词，移作店名，期冀执本行当之牛耳，实属愚蠢之极！”

明情至此，悬在陈布雷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下，他批了8个字：“愚民可恕，招牌难留。”此后，关门待罪的何凯，收牌退赁，挈妇携雏，回故里去了。（据《周末报》）

了大半。

蒋介石的前三任女人都是牺牲品，原配毛福梅给蒋生了蒋经国后即被冷落，后在战乱中炸死，结局凄惨。侧室姚氏就更是孤独终了。曾经被蒋介石爱过的女人陈洁如21岁就被迫离开，一生再未嫁人。

而宋美龄和蒋介石，两个并没有多少爱情基础的人，因为政治联姻，婚后有过红灯，也以责任为重，相伴下来。蒋介石还是很爱宋美龄的，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他还为她弄来牛奶喝，就因为她喜欢。而她对他也，又何尝不好。尊重他的意见，不参与政治。有一度减肥抽烟，因蒋不喜欢，她总是躲在书房里抽，后来还是戒了。这些微小又恩爱的细节，都是婚后慢慢培养出的感情。

人生往往如此，最后陪在身边的，不一定是最爱的，但也许是最适合的。（摘自《民国女子》）

宋美龄最想嫁的不是蒋介石

宋美龄在美国卫斯理学院读书时，也算引人瞩目。满身散溢着名媛的高贵气质，追求她的异国学生很多，也有让她动心的。

在美玲青春的岁月里，爱过并想嫁的男人并不是蒋介石。

其中传的最多的版本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刘纪文。刘纪文一表人才，谈吐风趣，是美玲哥哥哈佛大学的同学。相识后，两人一度商及订婚，但最终在现实面前刘纪文自动选择退出，理由是蒋介石出现，而刘的权势根本无法与蒋比。据说分手让宋美玲难过很多时日。

另一个版本则是美玲从美国返沪，在船上邂逅一位荷兰建筑师Van Eiveigh。这个有据可考的是他写给好友米尔斯的信。信中几次提及，表达自己对他的感情，说见到他：“头都昏了。”

这位荷兰建筑师船上一别对美玲也很好感，美玲给好友的信里说：家里人知道这件事简直气疯了，因为他是外国人而瞧不起他，好像他是个野蛮人。

后来Van Eiveigh提出要来上海找宋美玲，也被宋的家人拒绝。美玲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再次提及这件事：“他们担心要是他来了，我就会嫁给他，他们可真说对了。我好想一头倒在你我的沙发靠垫上哭。”

这些传说过的，美玲想嫁的男人，与蒋介石无关，那是纯的不掺一点杂质的情感。是有着青春女子激情与梦想的，与后来对蒋的感情有着质的区别。

不过在遭到家人的反对后，宋美龄的这个愿望算是破灭了。爱情的打击，一度让宋美龄情绪恶劣，无以排遣，只能给米尔斯写信倾诉。加之回国后，生活上很